

# 儒学在运河流域的源起与传播<sup>\*</sup>

谢光前<sup>\*\*</sup>

**【摘要】**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重要道路，儒学的产生以及发展过程在运河千百年的流波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儒学关爱“家国天下”，运河融通中华南北，理顺儒学的源起与传播与大运河的关系是当代理解运河文化价值的重要理据。

**【关键词】**儒学 大运河 文化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根深叶茂，博大厚重，儒家思想是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进程中影响最为广泛持久的显学。然而，运河之流变对中国文化的发生与交融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在运河沿线八省市都可以追寻到儒学生生不息的印迹。儒学关爱“家国天下”，运河融通中华南北，在高扬传统文化自觉，对文化基因系统溯源的当下，或许厘清儒学传播与运河之关联，对两者的发扬光大都极有意义。

## 一 运河区域的儒学源起

孔子以儒学宗师的身份开游学与游说之先河，学与说的内容及主体有诸多文献的记载，问题是这“游”的过程却很难得到一幅清晰的线路图，其师徒一行周游列国，往何处游？怎么游？乘车骑马，徒步行舟，难得有

<sup>\*</sup> 本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大运河精神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18WTD004）阶段性成果。

<sup>\*\*</sup> 谢光前，《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

个交代，当然这也不可能是《论语》之类著述的重点，不过，在孔子与弟子的对谈、对诸侯君王的劝告中却能发现孔子行走的大致路径。所谓周游列国，其实这“列国”的空间范围并不广袤，主要还是后来的大运河区域内的鲁、宋、卫、陈、齐等诸侯小国，在泗水、沂水、菏水等与运河贯通的流域内。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的活动范围以及过程有过描述，如“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sup>①</sup>等。

运河的开凿，实际是沟通自然水系的人工工程，而且这个工程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夫差开凿邗沟之后，就把淮北与淮南、江南联通起来了，虽然当时夫差是为了称霸而凿河，但实际也是南北文化的交流建立起了一条便捷的通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学的主要传播地域还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重点仍然是齐、鲁、卫等诸侯国。司马迁曾无限感慨地说“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sup>②</sup>子贡恰恰是“相鲁、卫，废著育财于曹、鲁之间，从政经商，不废所学”，而其他人如“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sup>③</sup>。可见他们的活动场域基本是在运河范围内。

其实，在孔儒之先，有当时被称为蛮荆之地的吴国产生了被孔子尊为“师”的季札。“札贤，寿梦欲立之，札让不可，弃其室而耕，乃舍之。诸樊卒，馀祭立，封札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sup>④</sup>季札贵为王位继承者，却三让天下，他以厚德而誉享吴地，司马迁赞之为是“见微而知清浊”<sup>⑤</sup>的人。季札生活的吴地，虽在当时是夷蛮之所，但季札先祖泰伯早已在该地传授礼义文明之理和农耕水利之技，开凿了一条影响深远的伯渎河，季札曾经出使鲁、齐、宋、郑诸国，他能通过听乐而知一国之盛衰，季札所

①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2006，第322、321、324页。

②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06，第752页。

③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2006，第700页。

④ 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2006，第190页。

⑤ 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2006，第195页。

治之地延陵（今常州）正是运河重镇，其时自西周以来的礼乐仁德大行其道，季札的身体力行影响甚远，因此得孔子尊敬并称为“师”，甚至还亲题“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葬”十字碑。

而后在战国时期为弘扬儒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亚圣”孟子和荀子也是在运河大地上阐发了各自的儒学思想。孟子是山东邹城人，在稷下学宫的诸子百家争鸣时，他积极传扬儒学要义，提出“性善论”，提倡以“仁政”而治天下，并且力主“民贵君轻”的思想。荀子是赵国人，曾短暂为官，晚年却隐居兰陵（泗水与沂水之间），正是儒学发达之地。他创“性恶论”，强调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他“完成了儒学的初步的创造性转化，同时也把区域文化的交融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sup>①</sup>

在春秋战国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运河区域的思想交锋尤为激烈，儒、道、法、墨、阴阳等各家都期望在国家管理的空间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但是真正能够根植于大地、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还只有儒与道两家。而儒家的“家国天下”的观念因更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以及贴近民众的生活诉求不断发扬光大。

## 二 汉儒复兴在运河区域

有意思的是，儒在秦被“坑”之后，使其再生的“春风”是来自运河畔、备受汉武帝倚重的国师董仲舒。董仲舒的故乡是大运河西岸的河北景县，古黄河、漳水在其境内。在董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先，汉初是崇黄老之说的，正由无为而治的治理之道盛行，儒学得以生息复兴，一大批生活在运河区域的士人对《礼》《乐》《诗》《书》加以阐发，《史记·儒林列传》有言“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轅面生，燕则韩大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sup>②</sup>董仲舒在武帝之时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

① 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上》，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197页。

②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2006，第701页。

进”<sup>①</sup>，因此儒学遂成治国之学，蔚为壮观。而彼时入《汉书·儒林传》的儒生们，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山东、河北等运河流域及辐射郡国<sup>②</sup>。董仲舒曾为江都王相，以其博学劝诫江都王刘非弃尚武而行仁政，甚得汉武帝厚待。而且，在山东的运河城市德州，既存有董子祠，还有董子的读书台，说董仲舒在德州治《春秋》三年“不窥园”。由此观之，儒学的初次复兴，倡在仲舒诸生，而始于运河流域流布。

汉武帝统治时期，据《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设立太学的建议，认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sup>③</sup>此后，董仲舒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具体落实，据《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举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sup>④</sup>。国家设立太学培养儒学人才，许多儒士赴京为官，以致“儒生大批携带儒家经典，抱着祖传的‘学而优则仕’的信条，沿着向关中运送漕粮所走的路线，踏上了西进的路程。于是儒学的传习区域逐渐向西推移，整个运河流域很快为儒家文化所浸染”。<sup>⑤</sup>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描述的儒家理想国情景是“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讲习大射乡饮之礼”<sup>⑥</sup>，这在汉代运河流域逐渐成为现实。

两汉之后，通常人们以为三国争霸重兵法之术而轻孔孟之道，实则不然。运河流域是孙吴的势力范围，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他即位之后便“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sup>⑦</sup>，让皇家弟子学习儒

①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3，第2523页。

② 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3，第2589~2622页。

③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3，第2512页。

④ 班固《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3，第172页。

⑤ 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上》，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197页。

⑥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2006，第700页。

⑦ 裴松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二》，国学网站-原典宝库。

学经典。孙权不好儒但并不废儒，因而成就了他的后代以及其官僚阶层出现了一批颇具风范的儒士，如孙登、韦曜（即韦昭）、孙休、孙焕、吴硕、张梁等，他们在淮泗到江南吴地一带为儒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贡献。

### 三 唐宋时期儒学在运河流域的传播

就运河的变迁史而言，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程建设莫过于隋炀帝开凿通济渠与永济渠，从而使一条河贯通中华南北，连接起五大水系。这不仅推动了唐帝国盛世的到来，而且使南北文化的交融有了通途。唐太宗李世民身边聚集的十八学士，他们大多出自山东、关中、江南、河北等运河流域，孔颖达、虞世南、房玄龄等硕儒大家为李世民在天下既定后治国理政建言献策，展示了儒士的睿智和谋略。其中孔颖达得李世民重用，太宗诏其主持与诸儒编撰《五经正义》，视儒家为思想正宗，遂成科举取士的经典。

儒学在唐朝的复兴与变革正是在运河中枢——洛阳肇始。这其中的重要代表是韩愈和李翱。

韩愈出生运河之畔的河阳（今河南孟县），其家境贫寒，但能砥砺奋进，幼专儒学，25岁及第高中进士，立志复兴儒学大业。东汉以降，历经战乱，其时民心惶恐，无以所寄，任由佛老盛行，儒学因此衰微甚是沉寂。唐一统天下之后，务必立治国安邦之学为正统。韩愈顺势而为，言“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全唐诗·石鼓歌》），自认自己是为传儒道而生，“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sup>①</sup>，且“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sup>②</sup>。韩愈将儒学的“修齐治平”融通，开创了儒学作为国家治理之道的新路；他倡导“道统说”，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公言”，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其思想在运河区域的流布，恰如运河之通济渠，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儒学的“上承道统，下启新运”，韩愈功不可没。

李翱是河南陈留人，与韩愈同时代，二人关系甚笃，李翱说韩愈“待予

① 韩愈《韩昌黎文集注释（上）·与孟尚书书》，三秦出版社，2004，第320页。

② 韩愈《韩昌黎文集注释（上）·原道》，三秦出版社，2004，第15页。

以友，讲文析道，为益之厚”<sup>①</sup>，深得韩愈思想精要，认为孔孟是“圣而贤者”，六经之旨在于“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浹朋友”。李翱传扬儒学，在运河一线可寻其踪，他曾著《南来录》，从洛阳沿运河而行至杭州的一路详情尽在其中，“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于漕，乙未，去东都。韩退之、石浚川假舟送予。……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注汴流，通河于淮。……丘戊，至楚州，丁卯，至扬州。……丁亥，官艘隙，水溺舟败。戊子，至杭州”。<sup>②</sup> 整个过程历时两个多月，李翱做了详细记载。一路上，他访友问僧，谈儒悟道，为今人了解运河文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李翱的“复性说”对宋明理学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影响，后来陆、王心学的根由也许可以在李翱的思想中得到理解。

两宋理学中兴，在儒学发展历史是一个标志性的时代。“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为宋代理学发端之先驱，他们同在运河畔的泰山栖真观苦读十年，后又分别在运河区域传道授业。胡瑗在浙江湖州办学立教，讲授经术。孙复隐居泰山，聚徒讲学著书，治《春秋》弘道统。石介创徂徕书院，授《易经》。南宋硕儒黄震曾说“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sup>③</sup> “伊洛而精”说的是奠定宋代理学根基的一代宗师“二程”兄弟独树一帜的“洛学”精要。其时北宋已呈国泰民安之象，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以汴京为都，洛阳则是文人会聚重地。汴洛之间，运河会通，儒风激荡。前述“三先生”之胡瑗，而后的“安乐先生”邵雍，又有“关学”鼻祖张载等大儒名士皆云集此间。程颢、程颐兄弟身居洛阳，备受时下浓郁的儒学明道事理之风的熏染，二程与邵雍毗邻而居，与张载则有表叔侄之亲，二人寻孔颜乐处之教，开悟得道，融汇贯通，独创“洛学”，将理学思辨之功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自居为孟子以下的传统大儒，以“天理”为核而纵论天地人间万物，其纲常之教遂成体系。

宋之理学，先有二程的洛学，后有朱熹的闽学，而中间使理学在存亡之间得以接续并且南传的关键人物是“道南先生”杨时。杨时“程门立

① 《全唐文》卷640。

② 李翱《南来录》，《全唐诗》卷638，中华书局，1980。

③ 《黄氏日抄》卷45。

雪”众所皆知，他秉承程颐“吾道南矣！”之愿，在运河城市常州、无锡传扬理学十八年。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在《重修东林书院记》中说，“杨龟山先生载道而南，与晋陵邹道乡诸先生讲学东林之上。……固程夫子所目为道南者也。晋陵之有宋儒学也，自龟山始也”。<sup>①</sup>东林书院立于无锡城东的弓河（运河）边，是为纪念杨时所建。杨时在理学存亡接续间完成“道南”的使命，由此而被誉为“闽洛中枢”。

#### 四 元明清时期儒学在运河区域的聚散

对元代统治者的认知，一般都停留在草原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马、“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印象上。其实，始于忽必烈统治下的元帝国，不仅截取直启动开凿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而且在国家治理中全面应用儒学的思想精华，以程朱理学作为巩固地位、维护政权的“国学”。而元代儒学的传扬，正是由郭守敬设计的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大都（北京）开始。忽必烈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后，决定迁都北京，随后采纳郭守敬的奏表开凿贯通南北的水运航线，以便使江南丰富的物产源源不断向北方运送，从而保证北京这个政治心脏的供需。北京既然是国中之中心，忽必烈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精心设计维护统治之策，同时在文化领域也是纲目并举，强化北京的核心地位。他采用程文海、王鹗等汉儒的建议，“京师首善之地，尤当兴建国学”<sup>②</sup>，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以明纲常伦理、等级礼制，以此凸显中央的政治权威，他推行“信用儒术”“以夏变夷”的国策，竭尽所能使统治之术与汉儒结合，从而“立经陈纪，为一代之制”。<sup>③</sup>在忽必烈的治国之策中，宋代的程朱理学被追捧为经典，他建太极书院，请被俘宋儒赵复教授“程朱二氏性理之书”。因此，先有杨惟中、姚枢、赵复等儒者的推动，随后窦默、许衡、刘因、王鹗等人相继加入，于是，理学在以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区域迅速而广泛地得到传播。各地的儒士如吴澄、虞集、揭傒斯、杨载、柳贯等，都曾向慕并北游大

① 见无锡东林书院内欧阳东风撰《重修东林书院记》碑。

② 程文海《雪楼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22页。

③ 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97，第377页。

都，也相继到元大都问学、入仕，正如元人郑玉所言，“京师者，天下之都会，而四方贤士大夫之所时集也”。<sup>①</sup>北京一时之间成为当时儒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儒士们向往的圣地，元人傅若金就曾说“为士者，身不至京师，不足以昌其道；为圣人子孙者身，不及阙里，不足以正其宗。”<sup>②</sup>至此，大运河不仅是元代东南物产输送到北方的大动脉，而且也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

明代儒学的沿革则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朱元璋开国之后，为巩固皇权，鼎力推崇程朱理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sup>③</sup>凡不合程朱理学的言辞皆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拒斥。但强权维护的道统因其墨守成规终究在明代中期趋于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阳明心学的崛起和迅速传布。王阳明生于运河城市绍兴的余姚，是中国古代能够实现人生“三不朽”的第一人，集立功、立德、立言于一身的杰出代表。他在贵州龙场悟道，在江西平定叛乱为国立功，他倡导“知行合一”“致良知”，于54岁时，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并在天泉桥留下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所谓的“天泉证道”。半个多世纪，“王学”成为大江南北士人奉为圭臬的显学，王门之后遍及天下，其中在运河区域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心学”传人人数众多，并且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学派，如浙中王学、北方王学（主要分布在山东）、泰州学派等，对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加以传播、发挥、创新，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展了心学的社会影响力，奠定了其在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到万历年间，阳明后学因为只事清谈不务实事走向了衰落，取而代之的恰恰是来自运河之畔的王阳明同乡刘宗周、黄宗羲以及东林学派的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所倡导的思想。刘、黄两人创倡“蕺山之学”，以心学而反对流于时弊的清谈“心学”。刘宗周以“诚意正心”“慎独致知”而通儒学至善之境；黄宗羲是明末清

① 郑玉《师山遗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9页。

② 傅若金《傅与砺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26页。

③ 陈鼎《东林列传·高攀龙传》，中国书店，1991。

初著述宏富的思想家，他强调“力行”哲学，提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和“必以力行为工夫”，力戒空虚学风；顾、高则是高举朱熹的大旗抛弃王学，在天崩地析的时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与阉党、与误国空谈之风抗争。他们为儒学在国之危难时期的存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运河与儒学在清代前期的帝王眼中是不可或缺的国之重器。康熙乾隆各沿运河六巡江南，除了解漕运、河工对国家政权巩固之价值外，还着力在南巡过程推崇儒学，抬高孔孟使道统与国家治理相融。康熙在1684年亲诣孔庙瞻仰，行三跪九叩大礼，书“万世师表”匾额；乾隆也到孔庙行礼，认为孔子“师尊万古”。如此“皇恩浩荡”，为儒学在清代的发展开启了方便之通途。

清代儒学的特征是崇实废虚，通经致用，力图匡时济世，这在清初的明末遗老黄宗羲的思想中得到充分体现，他曾说“儒之者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sup>①</sup>同时期来自运河人家苏州昆山的顾炎武更是直白地抨击清谈之风“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工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sup>②</sup>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认为必须正本清源，其通途是由器求道。他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提倡引古筹今，主张经世致用，以朴实学风追问儒学的本真精神。同样崇尚“实学”的思想者还有在北方运河区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颜李学派”，其代表人物颜元和李塨，他们长期在直隶（河北）和京师一带传习力行实学。乾嘉之时，学风偏转，以考据、训诂等为要务的儒学在运河城市苏州出现了惠栋为代表的“乾嘉吴派”，而后作为对古文经学的反动，庄存与创立的“常州学派”得到魏源、龚自珍等的发挥借以“托古改制”。鸦片战争之后，大运河逐渐出现淤塞、梗阻，儒学日渐式微，国运也呈现衰败之势，到20世纪初，南北运河不再贯通，漕运被废，大清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倒下！儒

① 黄宗羲 《时编修卉玉吴君墓志铭》，《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2009，第220页。

② 顾炎武 《日知录》卷9，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学的大旗也因此摇摇欲坠!

需要说明的是,辛亥革命后,随着五四运动以及大批志士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发起猛烈的抨击,要彻底砸烂孔家店之时,在江南无锡古运河河畔、与东林书院相去不远处,教育家唐文治先生兴办了为现代儒学发展留下根脉的无锡国专,它与居于北京的清华国学院一道,为培育出一大批继承弘扬儒学传统的学者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 五 科举、运河书院及儒的传播

今天看隋炀帝,已不再是只戴着一顶骄奢淫逸的帽子,开运河与兴科举无论如何都应该算他对古代中国的杰出贡献,他个人的德行与这两件功业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当然,因为前者而使他成了短命的皇帝,但是后者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却不可磨灭。如此我们便又找到了一个运河与儒学关联的理据,那就是兴科举在其中推波助澜的功用。古代的科举制乡试、县试之类较低层次的考试可以让稍有经纶者参加应考之外,但是进士科第,各地人士则要远赴京师应举,帝王要招纳天下英才,但诸多贤才却常常因山高路遥、道路艰辛而难以进京赴考,而在运河边生息的考生则可能因运河之便顺利抵达京师。为此,我们可以理解何以唐宋时期河南的状元居多,明清时期却是江浙的运河城市高中状元为甚,而僻远地区高中三甲者寥寥的缘由,这恰恰说明运河的通达对科考的影响,因为隋唐运河在唐宋时贯通河南,而京杭大运河在明清时直达江浙。吴仁安先生的《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有一统计,在清代的浙江籍进士中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布不均的现象,地处运河沿线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五府土地面积只占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但进士却占全省进士总数的91.3%<sup>①</sup>。从顺治到乾隆四朝钦定的状元共有61位,而江浙籍的有51人,占了84%。这一有趣的现象只能说明除经济的发达之外,重要的缘由就在于以运河为主干道的水系使参加应试的儒生行动便利,信息通达而在应对科举时能占得先机。科举在隋唐之后是

<sup>①</sup> 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3页。

中国政治舞台最重要的纳土渠道，应考的主要内容便是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那些经由运河参加科考的士生对儒学传播的重要作用。

科举制的兴起与书院的兴建几乎是唇齿相依、相伴而行的。诚然，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教育机构，许多书院都落址在空山幽谷、茂林修竹中，但是临水而建、交通便利也是兴建书院理想的选择。有科举制度之后，史载第一个书院是唐朝运河都市洛阳的丽正书院（又称集贤殿书院），其后书院在民间日渐兴盛。在运河区域，宋代的嵩阳书院（被誉为“四大书院”之首），商丘的睢阳书院（又称为“应天府书院”）、天官寺书院、伊川的明皋书院，以及山东的徂徕书院和杨时创办的东林书院，皆因传播儒学而声名远扬；元代的太极书院（京都）、同文书院（洛阳县）、缙山书院（偃师）、伊川书院（伊川）等也是影响甚大。明清时期更是书院大盛，为了应对科举，同时也是为了培养国家治理所需要的人才，教育活动基本围绕书院展开，在此期间，运河流域书院密布，就明朝中期而言，“山东一省新建书院87所，修复前代书院9所……其中有42所在运河流经州县及辐射地区”。<sup>①</sup>由此可见，运河便捷的交通对教育机构的发达，为儒学思想的散布以及扎根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 六 余言

在当代，互联互通是极其明显的时代特征，人的空间距离几乎不再是实现人与人之间交往交流的障碍。据于现代技术的万物互联是现实的存在，这对于古代社会而言，那是必须在奇妙的想象世界才有可能。古人的知识习得过程必须是通过行走中不断拜师求教才有丰富的契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有寓意，也是实际的表达。在复兴传统优秀文化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大运河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忘却的！

---

<sup>①</sup> 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和科举》，《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 参考文献

- 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06。
- 司马迁 《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2006。
- 司马迁 《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2006。
- 安作璋 《中国运河文化史上》，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 班固 《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3。
- 班固 《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3。
- 韩愈 《韩昌黎集·重答张籍书》，燕山出版社，1996。
- 韩愈 《韩昌黎集·原道》，三秦出版社，2004。
- 《全唐文》卷640。
- 李翱 《南来录》，《全唐诗》卷638，中华书局，1980。
- 《黄氏日抄》卷45。
- 程文海 《雪楼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宋濂等 《元史》，中华书局，1997。
- 郑玉 《师山遗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傅若金 《傅与砺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陈鼎 《东林列传·高攀龙传》，中国书店，1991。
- 黄宗羲 《时编修卉玉吴君墓志铭》，《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2009。
- 顾炎武 《日知录》卷9，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 吴仁安 《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王云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书院和科举》，《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 The Origin and Dissemination of Confucianism along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Xie Guangqian*

**Abstract:** The Grand Canal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spread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have left great legacies in the flowing currents of the Canal through thousands of years. Confucianism cares for the “family and nation” and the Canal connects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 together with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Grand Canal provides an important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day to understand the great cultural value of the Grand Canal.

**Keywords:** Confucianism; Grand Canal; Cultural Value